

---

# 中国大都市外来人口的居住隔离分析:以上海为例\*<sup>1</sup>

孙秀林 顾艳霞

(上海大学社会学院, 上海 200444)

**【摘要】**:在城市研究中,居住隔离一直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议题。在当今中国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的背景下,不同群体的聚居现象日益明显,如城市中的外来人口,往往倾向于在特定类型的居住地中聚居,与城市本地人口存在着明显的居住隔离。上海作为中国的特大城市,外来人口占全市常住总人口的40%,本文聚焦于不同省份的外来人口在上海市的居住隔离模式。首先,外来人口沿着城市中心以环状分布,呈现出点状和簇状的聚集形态,并且近郊区的外来人口比远郊区要更加密集。其次,不同地区的外来人口也存在明显的聚居现象,如中原地区、东北地区、华南地区的外来人口更容易居住在一起。最后,尝试进行相关机制的解释,并且希望为提高城市治理水平提供证据与建议。

**【关键词】**:居住隔离; 隔离指数; 聚居; 外来人口; 大都市

**【中图分类号】**:C912.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11X(2017)04-0120-10

## 一、引言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中国的流动人口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群体。国家卫生计生委员会在2015年底发布《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6》显示,我国流动人口年均增长约800万人,2015年已经达到2.47亿,逐年增长的流动人口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不可忽视的庞大群体<sup>②</sup>。庞大的外来人口进入城市,在为流入地输入大量的劳动力、为城市发展注入活力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给流入地带来了压力,譬如城市交通拥挤、公共资源供给不足以及居住紧张等问题,其中,居住问题是社会学非常关心的一个研究议题。

现有研究发现,外来人口在城市中的居住呈现非常明显的聚居特征。外来人口在进入城市之初,难以拥有立足之本,在居住地的选择上会有一些的偏向性,城市郊区、中心城区的外围等是常见的外来人口聚居区。一般来说,城市郊区的居住成本较低,郊区土地面积大,可容纳较多的外来人口,郊区与原本的农村生活环境较为类似,外来人口更易融入,适应新环境更快。之所以选择中心城区的外围居住,是因为中心城区人流量大,处于商务和消费的中心,能够获得工作机会。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之间的居住隔离,会带来各种负面的社会后果,不同居住区群体之间的隔离,会造成歧视、信息沟通不畅等后果,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

上海市作为中国特大城市,有着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信息资源,吸引了大量的外来人口。据《2015年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

---

<sup>1</sup>收稿日期:2017-05-09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我国新社会群体研究”(14BSH026)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孙秀林(1978—),男,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研究方向:社会组织、基层治理、空间社会学、大数据分析。

<sup>2</sup> ① 国家卫生计生委员会,《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6》,2016年10月19日。

---

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至 2015 年末，全市户籍常住人口 1433.62 万人，外来常住人口达 981.65 万人<sup>③</sup>。对上海的外来人口聚集现象进行分析，有助于我们认识上海的外来人口的居住模式，也可以对中国其他城市提供一定的借鉴。基于此，本文运用实证数据考察上海市外来人口聚集状况，然后进一步分析不同省份来沪人员的聚居模式，并在此基础上试图分析不同省份来沪人员聚居模式背后的作用机制，希望可以更加清楚地认识上海市外来人口的居住状况以及作用机制，提高城市治理的综合水平，为其他城市治理提供借鉴与建议。

## 二、文献回顾

### (一) 西方居住隔离的相关研究

隔离是指不同类别的社会群体分布差异的程度<sup>[1]</sup>，居住隔离是指不同的群体在居住空间层次上的不均匀程度<sup>[2]</sup>。居住隔离，又被称为空间分异，是指通过一些特征相区别的人群，这些特征包括种族、宗教、户籍、职业、教育程度、经济收入等，拥有相同特征的人群聚集在一起，没有共同特征的人群在居住空间上彼此分开<sup>[3]</sup>。居住隔离是西方学术界一直关注的重要议题，形成了多样的理论，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包括人类生态学派、行为学派以及制度学派<sup>[4]</sup>。

人类生态学派源于早期的芝加哥学派。20 世纪初，伴随着工业化的进行，美国城市化进程加速，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大量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如贫困、犯罪、环境污染、交通、不同群体的隔离等，面对城市发展过程中的诸多问题，芝加哥学派应运而生<sup>[5]</sup>。

芝加哥学派认为，城市是一个有机体，人们在其中不断地进行互动和竞争，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强者占据有利空间，弱者处于不利地位。居住隔离是竞争的结果，有些群体无力承担高昂的生活成本，自然分化形成了不同层次的群体，不同层次的群体聚居，呈现一种“马赛克”式的空间状态<sup>[6]</sup>。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伯吉斯提出的“同心圆模式”就是在试图说明这种现象，他认为，不同的群体在城市中的空间分布是不一样的：贫民窟处在第二环的过渡区；蓝领工人和低收入白领工人居住在第三环的工人住宅区；第四环和第五环的高级住宅区，主要是中上层阶级的住宅<sup>[6]</sup>。以此为蓝本，随后又出现了霍伊特的“扇形模式”，他指出，城市的住宅区由市中心沿交通线向外做扇形辐射，反应出不同阶级在城市区位中的分布<sup>[7]</sup>。而哈里斯的“多核心模式”则认为，低级住宅区多围绕工业中心分布，高级住宅区会形成城市的次中心，周边分布着文化中心、公园、运动场等<sup>[8]</sup>。上述的这些模型，都是试图通过展现城市的形态，达到理解城市的目的。在这种空间形态的展示过程中，本身就是不同群体、不同阶层在城市不同地域的分布，可以认为是居住隔离研究的起点。

人类生态学派注重客观的划分维度，通常从种族、职业、经济地位等角度分析居住隔离状况。研究发现，种族是美国城市居住隔离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中心城市和郊区是由不同的种族居住的，郊区几乎没有专门的白人聚集地，黑人大多聚集于此，并且数量在不断增长，白人则居住在中心城市中<sup>[9]</sup>。通过对美国城市不同种族移民的考察发现，外国出生的西班牙裔、亚洲人和黑人比本地出生的群体成员具有更高的居住隔离度<sup>[10]</sup>。在澳大利亚，本土出生的居民与其他国家出生移民到澳大利亚的居民之间也存在着隔离<sup>[11]</sup>。以社会经济地位划分的群体也有相似的结果，不同群体的居住隔离，与社会地位的差异高度相关<sup>[12]</sup>，社会距离相近或者经济地位相当的群体总是居住在一起<sup>[13]</sup><sup>[49]</sup>，专业技术人员与银行职员之间的居住隔离程度远低于专业技术人员与无技术工人之间的隔离程度<sup>[14]</sup>。

由于人类生态学派过度强调“适者生存”，把人们的居住行为视为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理性选择，忽视了居民的个人行为与感受，因此，注重个体特征的行为学派在 20 世纪中期以后开始兴起。行为学派认为，个体的心理特征与行为特征是形成社会空间的重要因素，居住隔离不仅表现在社会、人口特征和经济特征上，行为特征也是一个重要的维度。如有学者证明，黑人移民的居住隔离仅有一小部分可以归因于经济地位，很多复杂的因素需要其他变量进行解释<sup>[15]</sup>。行为学派关注居民的居留意愿与

---

<sup>3</sup> ①上海市统计局，《2015 年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6 年 3 月 1 日。

迁居行为,认为居民的意愿、观念是理解居住隔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移民和本地居民之间存在不同的历史传统与象征价值,观念上的差别导致其居住在不同的地区,即使有些群体在经济上能够达到拥有更好居住地的要求,但是由于歧视、心理偏见或者文化等因素使其难以自由选择居住地<sup>[16-18]</sup>。行为学派还特别关注迁居行为,认为居住地的选择取决于家庭,如社区型的家庭更加注重社区内的总体生活环境,在迁移时倾向于同类家庭的聚集<sup>[19]</sup>。邻里特征也是居民迁移的关键因素,白人相比于黑人更容易搬离原本居住的贫穷社区<sup>[20]</sup>。不仅如此,白人对于周边居住黑人的关注度远远超过了财富对其居住地点的影响,如果周边的黑人过多,白人会搬离原本居住的社区,寻求其他的住所,由此出现了“白人群飞”的现象<sup>[21-22]</sup>。总结来讲,行为学派认为,处于弱势一方的群体,特别是城市中的移民群体,由于歧视、自卑等心理,即使有能力去更好的社区居住,仍会选择居住在与自己文化背景相当的群体中;处于强势群体的一方则认为自己处在优势地位,不愿与低自己一等的弱势群体居住,因而会去寻求其他的住所。行为学派脱离了“唯经济论”,更多关注人们的心理因素与行为因素,以微观的视角对个人的行为进行分析研究。但是,这一理论过于强调个体因素,对于现实的社会背景和宏大的结构性约束考虑不够,所以招致制度学派的大量批评。

制度学派认为,居住隔离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家、政府的行为或其他制度因素产生的。制度学派的理论以雷克斯和莫尔的“住房阶级”理论以及帕尔的“城市经理人”理论为代表。“住房阶级”理论指出,不同的住房阶层在城市空间中居于不同的位置来源于生活机会的分配不均。自有产权者会居住在城市中设施、区位较好的地带,而移民群体绝大部分是租房者,在城市中没有自己的住房,因此,属于住房阶级的下层,难以获得良好的住房条件,只能居住在相对集中、设施较差的住房中<sup>[23]</sup>。进一步,帕尔对为何社会生活中会出现机会不均给出了解释,他认为,城市资源分配可能与个人在劳动力市场的位置没有任何关系,也并非完全取决于自由市场,城市中的资源管理者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决定着城市居民获得城市资源的机会<sup>[24]</sup>。如对荷兰少数民族群体的居住隔离研究发现,教育和劳动力市场准入机制是移民居住分异的关键<sup>[25]</sup>。国家在住房销售和租赁方面的努力,可以改变城市中的人口结构,包括不同种族的人口、移民群体等<sup>[26]</sup>。若能改变分配体系,则可以明显改善城市种族居住隔离问题<sup>[27]</sup>。

人类生态学派、行为学派以及制度学派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居住隔离进行了解释:人类生态学派注重自然选择,认为居住隔离是优胜劣汰的过程;行为学派则关注除了经济因素外的心理因素、文化因素;制度学派则关注宏观角度,以制度、政府行为来解释居住隔离。无论哪一种视角,在有关居住隔离的众多议题中,对移民群体的关注始终处在核心地位。移民群体在整个城市体系中处于特殊的位置,他们是整个城市化进程中的重要因素,却无法拥有本地居民的诸多福利。

## (二)国内居住隔离的相关研究

国内的居住隔离研究相较于国外来说起步较晚。早期以“城中村”的研究为起点,关注外来人口在城市中的聚集,特别是老乡群体的聚集现象。随着普查数据、调查数据的开放,越来越多学者使用社会区分析方法描述城市空间形态。近年来,也有学者开始尝试计算隔离指数、相异指数等,以实证的方法对居住隔离现象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研究。

1. 城中村分析。1980年代以来,大量的流动人口涌入城市,形成了众多外来人口聚居区。有研究指出,外来人口以进城务工的农村人口居多,由于房租低廉同时又能较快适应郊区的生活,许多外来人口倾向于居住在城市郊区<sup>[28]</sup>。这些外来人口通常来自于同一个省份或者县城,从事相同或相似的职业,由此被人们称为“浙江村”、“河南村”、“新疆村”等。对“浙江村”的研究发现,产业因素是外来人口聚居的影响因素之一,外来人口带着自身的综合性资本聚居,聚居地不仅是一个生活的场所,更是一个产业孵化地<sup>[29]</sup>。“河南村”的情况则大相径庭,居住在河南村的外来人口无资金、无技术,从事边缘职业,只有通过自身的劳动力资源获取生活所需,生活在“河南村”的流动人口同质性更强,聚居更多是一种心理因素,为了获得安全感与归属感<sup>[30]</sup>。对少数民族移民聚居区“新疆村”的研究发现,“新疆村”的外来人口主要从事餐饮业,进入城市多是依靠老乡带领,少数民族移民聚居区内部组织化程度更高,拥有集体行动的能力<sup>[31]</sup>。深圳“平江村”的研究发现,从内地山区到深圳从事运输工作的平江村移民群体利用老乡关系在城市中立足,在移民群体内部利用现有的关系,在群体的外部努力创造更多的社会关系,通过关系的不断累加,平江移民群体得以在深圳运输行业创造出一片新天地<sup>[32]</sup>。可以看出,外来人口在特定的居住地聚集,既有可能基于一定的地缘、血缘关系,也有可能是基于一定的社会资本、产业网络,还有可能是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

2. 社会区分析。随着中国普查数据的公开，学者们开始使用社会区分析、因子生态分析等方法对城市的居住隔离现状进行描述，关注的焦点主要在于空间分布的形态描述，在地理空间的层面将各个不同的维度特征展现出来。

作为外来人口的主要流入地之一，上海的相关研究比较成熟。诸多证据表明，上海城市社会空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籍贯隔离<sup>[33]</sup>，外来人口成为反映上海市社会空间地域差异的主成分之一<sup>[34]</sup>。有学者使用五普数据发现，上海市外来人口聚居区是多核心结构分布，以点状零星分布在近郊地带<sup>[35]</sup><sup>[21]</sup>，更进一步，可以细分为城郊边缘带与城市郊区两种类型<sup>[36]</sup>。外来人口群体的住房设施情况较差，独立卫生间、独立厨房、洗浴设施等设施指数较低<sup>[37]</sup>。居住状况会严重影响社会融合程度以及居住满意度，居住在与自己文化背景、习惯相同或相似地区的外来人口会更易融入城市，有更高的满意度<sup>[38]</sup>。

对北京的研究发现，外来人口是北京市社会空间结构的主因子，外来人口聚居区是 1982 年以来一直存在的社会区之一<sup>[39]</sup>。北京市外来人口聚居区呈现出团聚状、条带状、散点状以及片状的结构形态<sup>[40]</sup>，而且，少数民族与流动人口成为影响北京市居住形态分布的重要因素<sup>[41]</sup>。

在对广州的相关研究中，有学者提出，广州的外来人口主要以圈状格局分布在中心区的外围区域<sup>[42]</sup>，以移民为主的新开发区成为独特的移民聚居区<sup>[43]</sup>，更是出现了以地缘为纽带的分省市的亚文化区<sup>[44]</sup><sup>[76]</sup>。

除了在上广等一线城市进行因子生态分析之外，在其他城市也开展了多样的研究。南昌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外来人口是社会区分异的因子之一，并且形成了省内外来人口区、主干家庭区等<sup>[45]</sup>。西安的居住空间分异现象日益增大，经济收入水平的差异成为主要的影响因素，外来人口相对来说处于弱势地位，与中高收入阶层间存在着较大的隔离<sup>[46]</sup>。深圳的外来人口聚居区处于城市的外围和边缘区域，形成了一种“边缘社区”的异质形态<sup>[47]</sup>。尽管城市空间分异状况愈加复杂，外来人口却一直是社会区分析中的主因子，并且绝大部分城市都有较为独立的外来人口聚居区。

近年来，随着城市居住隔离状况的日渐复杂，学者们开始进行更深入的实证分析，试图更进一步对城市居住隔离情况进行详细的解释。早先就有学者使用北京人口普查的抽样数据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同一省份的外来人口在居住地方面有一定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主要是基于社会网络形成的，存在着“连锁迁移”现象<sup>[48]</sup>。在广州源自湖北籍外来人口聚居而成的“湖北村”，可以视为一种“乡缘社区”，该社区的形成是基于湖北地域特色之上的产业网络<sup>[44]</sup><sup>[82]</sup>。更进一步，有学者发现，外来人口的聚居体现为“主动聚居、被动隔离”的社会排斥机制，聚集在一起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经济收入<sup>[49]</sup>。外来人口的居住与就业机会有极大的关系，职住一体化是外来人口空间分布的主要特征<sup>[50]</sup>。

综合上述研究可以发现，国内居住隔离的相关研究聚焦于个案城市的状况呈现，相较于国外，大部分仍然是对城市空间形态的展现，而缺乏更深层次的机制解释。在现有关于外来人口聚集区的研究中，多数集中于外来人口聚居区内部的人口特征、产业特征以及空间特征，少有考虑到移民的不同来源地这一因素的。因此，本文试图对于不同省份外来人口在沪的居住隔离进行比较研究，进一步深化对于大都市外来人口居住隔离的研究。

### 三、外来人口在沪的居住隔离分析

#### (一) 居住隔离的测量指标

本文使用相异指数(又称居住隔离 D 指数)对上海市外来人口居住隔离状况进行测量。相异指数是由邓肯等人于 1955 年提出，是使用时间最长、应用最广泛的测量居住隔离的指标<sup>[15]</sup><sup>[496]</sup>，具体公式如下：

$$D = 0.5 \times \sum_{i=1}^n \left| \frac{x_i}{X} - \frac{y_i}{Y} \right| \quad (1)$$

在(1)式中,  $x_i$  为区域  $i$  单元中  $X$  群体的人数(如在某个居委会中外地人的数量),  $X$  为整个城市中  $X$  群体的总人数(如全上海外地人的数量),  $y_i$  为区域  $i$  单元中  $Y$  群体的人数(如在某个居委会中本地人的数量),  $Y$  为整个城市中  $Y$  群体的总人数(如全上海本地人的数量)。  $D$  表示两个群体的隔离程度, 取值范围从 0 到 1, 0 表示两个群体在研究区域内均匀分布, 1 表示两个群体在研究区域中完全隔离。在实际的运用中,  $D$  指数只能在全局层次上计算不同群体的居住隔离程度, 即在一个层次上只能计算一个隔离指数, 而无法在同一层次不同区域分别计算隔离指数, 例如: 在计算上海市居住隔离指数的时候, 不能同时计算区县层面的隔离指数。基于此, 有学者对(1)式进行修正, 提出了可进行局部计算的相异指数<sup>[51-52]</sup>, 具体公式如下:

$$D_i = 100 \times \left( \frac{x_i}{X} - \frac{y_i}{Y} \right) \quad (2)$$

公式(2)中,  $D_i$  表示两个群体的隔离程度, 取值范围从-100 到 100。0 表示两个群体在研究区域内均匀分布, -100 与 100 表示两个群体在研究区域中完全隔离, 当相异指数大于 0, 则意味着本区域内此要素比相对群体更加聚居<sup>[53]</sup>。例如, 以山东省外来人口为研究对象, 指数大于 0, 指的是在此区域内的来自山东省的外来人口占全市山东省外来人口的比例高于本地人口占全市本地人口的比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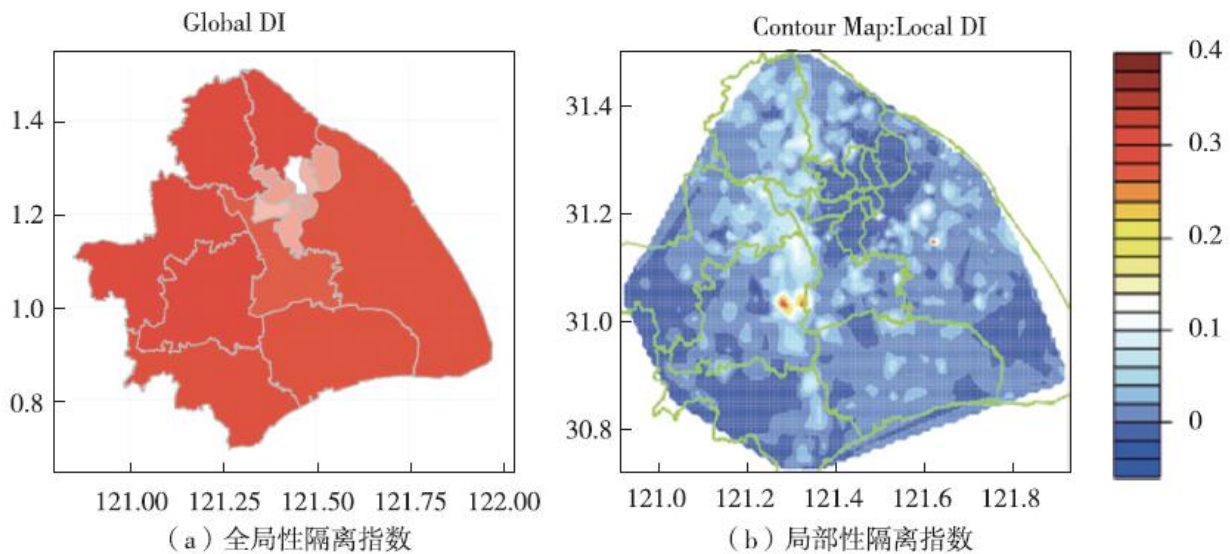
公式(1)和公式(2)是在不同的层次上进行隔离指数的计算, 公式(1)是在整个上海市的层次上进行外来人口与本地人的比较计算, 得到全局性的居住隔离指数。公式(2)用于计算局部的居住隔离指数, 可以在每个居委会(或者每个街道、乡镇)层次上进行外来人口与本地人的比较计算。

使用上述两种相异指数的计算方法, 本文计算 4 种相异指数: 首先, 把所有的外来人口视为一个同质性群体, 计算上海市全部外来人口的全局性隔离指数和在每个村居委层面上的局部性隔离指数。然后, 对 29 个省份的外来人口分别进行计算, 得到每个省份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之间的隔离指数, 即每个省份在沪外来人口的全局性隔离指数和在每个村居委层面上的局部性隔离指数。

## (二) 上海市居住隔离的总体情况

首先, 计算全部外来人口对于本地人口的全局性居住隔离指数。全上海的  $D$  指数为 0.4241, 这个指数在不同区之间也存在巨大差异。从图 1a 中可以看出, 青浦区、松江区等远郊区中外地人口对本地人口的居住隔离指数最高, 浦东新区、宝山区和嘉定区等近郊地区则处于中间地带, 而长宁区、虹口区、徐汇区、静安区和黄浦区这些中心城区的居住隔离指数最低。在上海市的全局层次上, 呈现出由内向外逐渐递增的趋势, 说明外来人口进入上海, 更加倾向于居住在郊区而不是中心地带。我们可以看出, 居住隔离指数的大小分布符合“上只角”和“下只角”中所反映的区域分化问题, “上只角”中的黄浦区、静安区、徐汇区、长宁区等居住隔离指数较低, “下只角”中的普陀区、嘉定区、奉贤区、青浦区、金山区等居住隔离指数较高。

其次, 计算全部外来人口对于本地人口的局部性居住隔离指数。从图 1b 中我们可以看出, 与全局性的居住隔离指数类似, 局部性的隔离指数也呈现出一种同心圆式的分布, 中心城区的隔离指数最低, 其次是远郊区, 近郊区比远郊区的居住隔离指数更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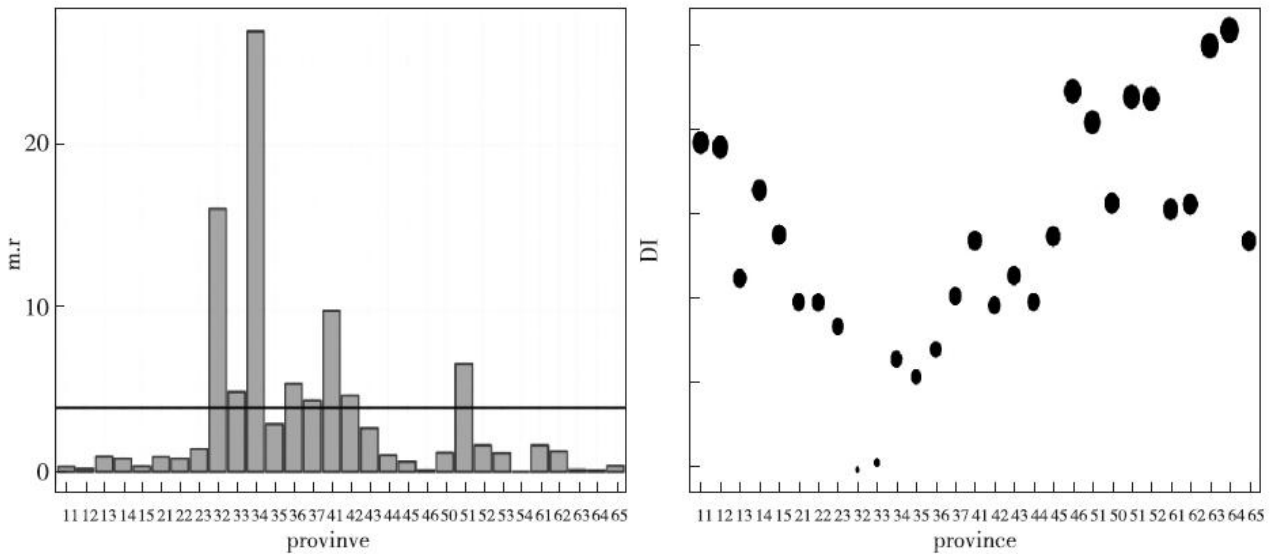
注:颜色的深浅表示分异指数的大小;崇明岛未在图中显示。

图1 上海市外来人口的隔离指数

并且,外来人口的居住分布并不是孤立的,也不是匀质的,通常以聚居形式存在,呈现出点状或簇状的聚集形态,特别是在松江区的九亭镇、新桥镇,闵行区的浦江镇、七宝镇,浦东地区的三林镇等隔离指数最高,这些地区本就是传统的外来人口聚集区,外来人口分布非常密集。

### (三)不同省市来沪人员的居住隔离情况

外来人口的大群体可以分为不同籍贯的子群体,通过计算各个省市外来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发现,各个省市在沪的外来人口中,安徽省、江苏省、河南省、四川省所占比重最大,其次是江西省、浙江省、湖北省和山东省,这8个省在沪人员占全部在沪人员的79.36%,其余省份的外来人口占全部外来人口的20.64%,具体分布如下图2a所示。



(a) 各省市在沪人员相对百分比

(b) 各省市在沪人员的居住隔离指数(全局性)

注：横轴是指省份国标代码,所对应的省市分别是: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福建省、江西省、山东省、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海南省、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藏自治区因数据缺失未能展现。左图纵轴是各省外来人口在总外来人口中所占百分比,右图纵轴是由公式1计算得出相异指数。

图2 各省市在沪人员情况

考虑外来人口的籍贯因素,根据各省市在沪的总外来人口,可计算各省市外来人口相对于本地人口的全局性隔离指数以及局部隔离指数,得到各个省市在整体层次和局部层次的居住隔离状况。

首先,计算全局性居住隔离指数。各个省份外来人口的居住隔离指数是根据公式(1)计算得出,关注在上海市整体层次上29个省份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的居住隔离程度。由图2b可知,各个省份的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存在不同程度的隔离,江苏省和浙江省的居住隔离程度最低,青海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隔离程度最高。海南省、重庆市、贵州省、云南省的居住隔离程度均居于高水平。福建省、安徽省、江西省、黑龙江省处于较低水平,其他省市处于中间地位。从地区层面看,西南、西北地区省份的外来人口在沪的居住隔离明显比华东地区的外来人口居住隔离程度要高得多,而东北、华北地区的居住隔离程度处于平均水平。

其次,计算局部性居住隔离指数。以省市为单位,使用公式2计算,关注每个省市在村居委会层面上的居住隔离状况,分别计算隔离指数(图略)<sup>④</sup>,得到以省份为单位的多个隔离指数,以热力地图的形式展现出来。由图可以得出,不同省份的居住隔离不尽相同,但仍然存在一些共同的特征。外来人口不会在静安区、黄浦区、徐汇区等城市中心地带聚居,即内环以内极少有外来人口。从内向外的内环、中环、外环和交环线中,外来人口依次增多,以外环和交环线之间的环状地带中外来人口最多,呈现出一种沿着城市中心的环状、圈层式分布。在郊区成为主要流入地的基础上,我们发现,近郊区的外来人口明显比远郊要更多,分布更加密集,松江区、闵行区、嘉定区、浦东新区成为外来人口聚集最多的地方,可能的原因是近郊区相较于远郊区距离城市中心更近,可以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获得更丰厚的经济收入。

#### (四) 外来人口在沪居住隔离的机制分析

<sup>4</sup> ④ 具体每个省份外来人口在上海市的居住隔离分布图,未能在文中展现。读者如有兴趣,欢迎直接向作者索取。

前面图 1 显示，不同省份外来人口与本地人之间的居住隔离程度不同，省份的特征会影响外来人口与本地人的居住隔离状况，经济基础、社会文化等都有可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有学者提出，社会阶层的分化是居住隔离形成的社会经济基础，不同阶层由于经济能力不同，对居住的需求也存在着差异<sup>[54]</sup>。各个省份流出人口的数量可能在一定程度影响居住隔离，流出人口越多，以血缘、地缘为基础的社会关系发生作用，来自同一省份外来人口更易居住在一起；另外，以地理区位相区分的南方北方、饮食习惯等都是我们需要考虑的影响居住隔离的因素。基于此，本文使用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以及 2015 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选取人均 GDP、人均可支配收入、第一产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在沪总人数、各省流出人口比例、地区(南方、北方)、饮食习惯(小麦、大米)作为自变量，各省的全局性居住隔离指数作为因变量进行 OLS 回归计算，得到相应的计算结果如下表 1:

表 1 对居住隔离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结果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人均 GDP[log]	-0.197 (0.118)			-0.147 (0.106)
人均可支配收入[log]	-0.264** (0.088)			-0.348*** (0.082)
第一产业增加值[log]	-0.072* (0.030)			-0.086** (0.028)
第三产业增加值[log]	0.214 (0.111)			0.211* (0.097)
在沪总人数[log]		-0.056** (0.020)		-0.030* (0.012)
各省流出人口比[log]		0.008 (0.024)		
地区 (南方=1)			0.001 (0.053)	
饮食 (大米=1)			-0.091 (0.052)	0.062* (0.026)
截距	3.493*** (0.747)	0.965*** (0.135)	0.401*** (0.028)	4.295*** (0.705)
R <sup>2</sup>	0.7438	0.5274	0.1654	0.8201
调整后的 R <sup>2</sup>	0.7028	0.4924	0.1035	0.77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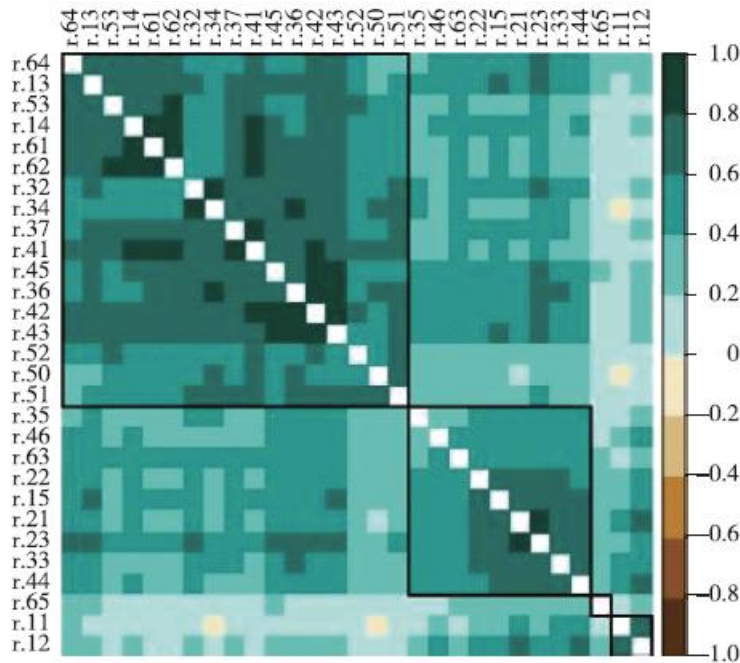
注: \*P<0.05, \*\*P<0.01, \*\*\*P<0.001;括号内是标准误。

表 1 呈现出各种因素对居住隔离指数的影响作用。首先，可以发现，各类经济指标对于居住隔离的影响最大，人均可支配收入越高，隔离指数越低，各省的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越不隔离；第一产业也有类似的结果，增加值越大，隔离指数越低；与人均可支配收入以及第一产业增加值不同，第三产业增加值越高，居住隔离指数越大，即来源地省市第三产业越发达，隔离指数越大，外来人口对本地人口的居住隔离程度越大。其次，在沪的总人口也对居住隔离产生作用，来源地省份在沪人数越多，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间的居住隔离程度越大。再者，饮食习惯对于居住隔离也有显著的影响，主食为大米的省份相比主食为小麦的省份的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间的居住隔离程度更大。而各省流出人口的比例以及南北方的地区因素对于居住隔离没有显著的影响。

上述讨论是一维的角度，只关注每个省份的外来人口与上海本地人之间隔离状况，省份与省份之间也会存在居住隔离的状况，不同省份的外地人住在同一个地区的概率也是不一样的。有些省份的人，可能更愿意与某些特定省份的人住在一起，而不愿意与另外一些省份的人住在一起。因此，本文以每个省份的居住隔离指数进行两两相关，并做成相关矩阵图，以展现不同省

份之间的聚集，颜色越深，表示两个省份的居住隔离指数越相关，两个省份的外来人口更易聚集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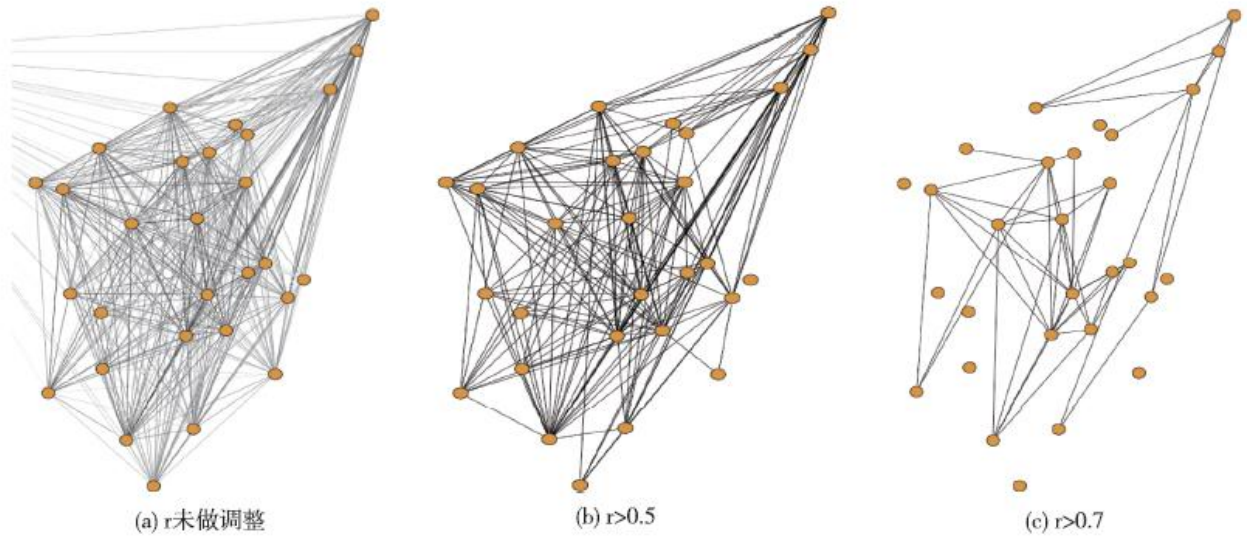
由图 3 的相关矩阵图可知，京津地区的外来人口更容易聚居在一起；西南、西北省份的外来人口更易聚居在一起；中部地区的湖南、湖北省份的外来人口在沪更易聚集在同一村居；河南省、陕西省等中原地区的外来人口更易聚居在一起；广东、广西、福建、海南、浙江、辽宁、黑龙江这几个省的外来人口更容易聚集在一起，即沿海一线的省份更容易在沪聚集。



注：横轴和纵轴是指省份代码的居住隔离指数，所对应的省市分别是：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福建省、江西省、山东省、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海南省、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藏自治区因数据缺失未能展现。

图 3 各省份间居住隔离指数的相关矩阵

为了更清楚地看清这一点，我们使用省会作为每个省的标示(node)，用两个省市在沪人员居住在每个村居委相对比例的相关系数作为连线(edge)的权重(weight)，做出不同省份之间聚居程度的网络图(图 4a)。为了更清楚地分析不同省份之间的聚集情况，我们进一步将相关系数  $p$  调整为 0.5 以上(图 4b)、0.7 以上(图 4c)，从而剔除不重要的关联。从地理上看，更易聚居在一起的在沪外来人口来源地是有共同的边界或邻近的，譬如东北三省，西南、西北地区省份，地理上的邻近意味这些地方的外来人口在生活习惯、文化背景上接近或相似，相互之间适应更快。除了地理空间上的邻近性，我们发现，东部沿海省份的外来人口更易聚居在一起，共同的沿海地区生活经验是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之一，即便不是地理空间上的接近性，地理空间的相似性也影响了外来人口在沪的聚居。



注:西藏和新疆的数据未显示。

图4 不同省份相关系数的网络关联图

#### 四、结语

本文使用上海市人口数据,以来源地为标准,进行全局和局部的居住隔离指数的计算。结果显示,不同省份的外来人口与上海本地人口之间的隔离程度不同。外来人口在上海市呈现由内向外的圈层式分布,并且存在以传统的外来人口聚居区为主的点状、簇状分布。经过初步的线性回归分析发现,经济发达的省份居住隔离程度较低,经济欠发达省份居住隔离程度高,来自于经济欠发达省份的人更易聚集在一起。更进一步,通过考察不同省份之间外来人口的相互作用发现,京津地区的外来人口、中部地区的外来人口、西南和西北的外来人口、沿海一线的外来人口更易聚集在一起,地理空间上接近、相似省份的外来人口更易聚居在一起。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通过描述分析展现了上海市外来人口居住隔离状况的整个图景,但是在机制解释方面略显不足,只能通过基础的描述得到初步的结论,下一步,希望能够深入理解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外来人口之间居住隔离程度的机制与因素。

#### 参考文献:

- [1] White M J, Rebecca Wang, 朱格, 等. 居住隔离论:理论与方法的比较研究[J]. 山东社会科学, 2016(1):96-106.
- [2] White M J, Kim A H, Glick J E. Mapping Social Distance Ethnic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in a Multiethnic Metro[J]. Sociological Methods & Research, 2005, 34(2):75-203.
- [3] Massey D S, Denton N A. The Dimensions of Residential Segregation[J]. Social Forces, 1988, 67(2):281-315.
- [4] Pacione M. Urban Geography: a Global Perspective[J]. Routledge, 2005, 23(2):97-102.
- [5] 孙秀林. 城市研究中的空间分析[J]. 新视野, 2015(1):70-71.
- [6] Burgess E W. The Growth of the City[M] // in Park R. E. et al. (eds) The City,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

1925.

[7] Hoyt H. The Structure and Growth of Residential Neighborhoods in American Cities[J]. *Development*, 1939, 19(3):453-454.

[8] Harris C D, Ullman E L. The Nature of Cities[J].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 Social Science*, 1945, 242(1):7-17.

[9] Farley R. The Changing Distribution of Negroes Within Metropolitan Areas:The Emergence of Black Suburbs[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70, 75(4):512-519.

[10] Iceland J, Scopilliti M. Immigrant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in Us Metropolitan Areas, 1990-2000[J]. *Demography*, 2008, 45(1):79-94.

[11] Timms, Duncan. The Dissimilarity Between Overseas-born and Australian -born in Queensland:Dimensions of Assimilation[ J]. *Sociology and Social Research*, 1969, 4(1):363-374.

[12] Guest A M, Weed J A. Ethnic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Patterns of Change [ 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76, 81 (5):1088-1111.

[13] Duncan O D, Duncan B. Residential Distribution and Occupational Stratification[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55, 60(5):493-503.

[14] Fine J, Glenn N D, Monts J K. The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of Occupational Groups in Central Cities and Suburbs[J]. *Demography*, 1971, 8(1):91-101.

[15] Taeuber K E, Taeuber A F. The Negro as an Immigrant Group:Recent Trends in Racial and Ethnic Segregation in Chicago[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64, 69(4):374-382.

[16] Clark W A V, Cadwallader M. Residential preferences:an Alternate View of Intraurban Space[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1973, 5(6):693-703.

[17] Jonassen C T. Cultural Variables in the Ecology of an Ethnic Group[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49, 14(1):32-41.

[18] Jones E B. *A Social Geography of Belfast*[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19] Shevky E, Bell W, Duncan O D. Social Area Analysis[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55, 61(1):84-85.

[20] South S J, Crowder K D. Escaping Distressed Neighborhoods:Individual, Community, and Metropolitan Influences[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97, 102(4):1040-1084.

[21] Crowder K, Chavez E. Wealth, Race, and Inter-Neighborhood Migration[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

2006, 71(1):72-94.

[22] Kyle Crowder, South S J. Spatial Dynamics of White Flight: The Effects of Local and Extralocal Racial Conditions on Neighborhood Out-Migration[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08, 73(5), 792-812.

[23] Rex J, Moore R. Race, Community and Conflict[M]. 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24] Pahl R E. Whose city? and Further Essays on Urban Society[M]. Penguin, 1975.

[25] Musterd S, Ostendorf W.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and Integration in the Netherlands[J].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2009, 35(9):1515-1532.

[26] Taueber K E. Racial Segregation:The Persisting Dilemma[J].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 Social Science, 1975, 422(422):87-96.

[27] Mitchell R E, Smith R A. Race and Housing:A Review and Comments on the Content and Effects of Federal Policy[J].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 Social Science, 1979, 441(1):168-185.

[28] 吴晓. “边缘社区”探察——我国流动人口聚居区的现状特征透析[J]. 城市规划, 2003, 27(7):40-45.

[29] 王汉生, 刘世定, 孙立平, 等. “浙江村”:中国农民进入城市的一种独特方式[J]. 社会学研究, 1997(1):58-69.

[30] 唐灿, 冯小双. “河南村”流动农民的分化[J]. 社会学研究, 2000(4):72-85.

[31] 杨圣敏, 王汉生. 北京“新疆村”的变迁——北京“新疆村”调查之一[J]. 西北民族研究, 2008(2):1-9.

[32] 刘林平. 外来人群体中的关系运用——以深圳“平江村”为个案[J]. 中国社会科学 2001(5):112-124.

[33] 虞蔚. 城市社会空间的研究与规划[J]. 城市规划, 1986(6):25-28.

[34] 祝俊明. 上海市人口的社会空间结构分析[J]. 中国人口科学, 1995(4):21-30.

[35] 李志刚, 吴缚龙. 转型期上海社会空间分异研究[J]. 地理学报, 2006, 61(2):199-211.

[36] 罗仁朝, 王德. 上海市流动人口不同聚居形态及其社会融合差异研究[J]. 城市规划学刊, 2008(6):92-99.

[37] 李志刚. 中国城市“新移民”聚居区居住满意度研究——以北京、上海、广州为例[J]. 城市规划, 2011, 35(12):75-82.

[38] 汪明峰, 程红, 宁越敏. 上海城中村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合及其影响因素[J]. 地理学报, 2015, 70(8):1243-1255.

[39] 冯健, 周一星, 王晓光等. 1990年代北京郊区化的最新发展趋势及其对策[J]. 城市规划, 2004, 28(3):13-29.

[40] 刘海泳, 顾朝林. 北京流动人口聚落的形态、结构与功能[J]. 地理科学, 1999, 19(6):497-503.

- 
- [41] 顾朝林, 王法辉, 刘贵利. 北京城市社会区分析[J]. 地理学报, 2003, 58(6):917-926.
- [42] 李志刚, 吴缚龙, 肖扬. 基于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广州新移民居住分异研究[J]. 地理研究, 2014, 33(11):2056-2068.
- [43] 郑静, 许学强, 陈浩光. 广州市社会空间的因子生态再分析[J]. 地理研究, 1995, 14(2):15-26.
- [44] 李志刚, 刘晔, 陈宏胜. 中国城市新移民的“乡缘社区”:特征、机制与空间性——以广州“湖北村”为例[J]. 地理研究, 2011, 30(10):1910-1920.
- [45] 吴骏莲. 南昌市社会区分异研究——基于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D]. 南京大学, 2003.
- [46] 邢兰芹, 王慧, 曹明明. 1990年代以来西安城市居住空间重构与分异[J]. 城市规划, 2004, 28(6):68-73.
- [47] 饶小军, 邵晓光. 边缘社区:城市族群社会空间透视[J]. 城市规划, 2001(9):47-51.
- [48] 于洪涛. 北京市外来劳动人口从业类型及居住地的省份聚集性分析[J]. 南方人口, 2002, 17(3):38-42.
- [49] 李志刚, 薛德升, Michael Lyons 等. 广州小北路黑人聚居区社会空间分析[J]. 地理学报, 2008, 63(2):207-218.
- [50] 刘涛, 曹广忠. 大都市区外来人口居住地选择的区域差异与尺度效应——基于北京市村级数据的实证分析[J]. 管理世界, 2015(1):30-40.
- [51] Wong D W S. Enhancing Segregation Studies Using GIS[J]. Computers Environment & Urban Systems, 1996, 20(2):99-109.
- [52] Wong D W S. Conceptual and Operational Issues in Incorporating Segregation Measurements in Hedonic Price Modeling Hedonic[J]. Methods in Housing Markets. 2008:159-175.
- [53] 梁海祥. 双层劳动力市场下的居住隔离——以上海市居住分异实证研究为例[J]. 山东社会科学, 2015(8):79-86.
- [54] 宣国富. 转型期中国大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研究[M].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0.